

湖南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考释*

余 兰

(江苏海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江苏 连云港市 222005)

关键词: 高庙文化; 白陶; 凤鸟纹; 造型; 意象

摘 要: 高庙文化出土了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白陶, 陶器上刻画和戳印着凤鸟纹、太阳纹、獠牙兽面纹和八角星纹等丰富的图像, 其中白陶残片上的凤鸟图案经考证为我国史前发现最早的凤鸟纹。本文利用考古类型学和符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 对高庙文化白陶上不同造型和组合的凤鸟图式进行分析, 同时运用文献与出土实物进行二元互证, 并结合当地特有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探究图像的象征意义。研究表明, 高庙文化出土白陶凤鸟纹作为中国传统凤鸟纹的雏形, 反映出上古时期人们对“神鸟”类动物的自然崇拜和精神信仰, 蕴含古代早期的时空观和宇宙观, 也为研究其他神性动物纹样装饰艺术奠定了基础。

Keywords: the Gaomiao Culture; white pottery; phoenix patterns; stylization; iconography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white pottery vessels with distinctive local characteristics have been unearthed at the Gaomiao Culture. They bear intricate incised and stamped motifs, including phoenixes, solar symbols, bared-fang theriomorphic designs and octagram patterns. The phoenix patterns on white pottery shard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he earliest prehistoric phoenix images ever found in China. This article employs methodologies of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and semiotic iconography in the analysis of morphological variations and combinatorial arrangements of the phoenix patterns on white pottery vessels unearthed from the Gaomiao Culture. Meanwhile, it cross-examines relevant texts and unearthed artifacts. It also contextualizes the phoenix patterns in unique local social practices and cultural customs to explore their symbolic meanings. As the prototype of China's traditional phoenix images, the phoenix patterns on white pottery vessels unearthed from the Gaomiao Culture reflect ancient people's worship of "divine birds" and their spiritual beliefs, embody spatio-temporal and cosmological concepts of ancient times, and are of foundational significance for the research into other theomorphic zoomorphic ornamentation in early ritual art.

一、引 言

高庙文化的两大重要遗址高庙遗址与千家坪遗址年代大体同时、文化内涵相近。其中, 高庙遗址位于湖南省怀化市洪江市安江镇东北约5千米的岔头乡岩里村, 地处沅江与其支流下溪的交汇地带, 于1986年文物普查时被发现, 分布面积大约3万平方米^[1]。高庙遗址出土了大量白陶器, 陶器表面戳印形态各异的凤鸟纹、獠牙兽面纹和八角星纹

等。贺刚教授曾判断这些戳印的图案是原始高庙人对于大自然中阳光、雨露和五谷丰登的崇拜, 而遗址中大量的鸟形纹就是当时古人心目中的凤凰, 这一发现为揭开凤凰“诞生”之谜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2], 对于研究我国装饰纹样史意义重大。高庙遗址和千家坪遗址作为高庙文化的核心遗址, 出土的各类遗存更是解读高庙文化内涵、还原史前先民生活与信仰的关键实物载体。

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的学术研究始于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国经典织物纹样谱系研究”(项目编号: 20AG009)、江苏海洋大学“海州湾英才”创新计划项目“中国古代凤纹谱系研究”和2026年度连云港市社科联应用研究资助项目“AI赋能连云港文旅数智化深度融合发展研究”(项目编号: 26SKD1-122)的成果。

1986年,考古报告中公布了凤鸟纹标本资料,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之后,相关专家和学者开始聚焦白陶上纹样的形态分类与寓意解读,如贺刚确立了凤鸟纹与先民自然崇拜相关的主流观点^[3];郭伟民、尹检顺以千家坪遗址相关遗存为背景,通过数字技术完善了白陶上凤鸟纹的分类研究^[4];王仁湘则拓展了纹饰内涵的解读视角^[5]。本文以高庙文化白陶上标志性纹饰——凤鸟纹为切入点,通过系统梳理其形态、戳印工艺及分布特征,深入考释其蕴含的原始信仰内涵与文化象征意义,明确凤鸟在高庙文化装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为早期陶器装饰纹样和史前先民精神信仰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二、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造型分类

高庙文化在白陶上戳印篦点和刻画装饰图案是其最突出的艺术特征,纹饰丰满厚重,图案种类繁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形态各异的凤鸟纹及其组合。在这之前,学界普遍认为,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双凤朝阳”象牙雕刻碟形器^[6]上的凤鸟纹,(图一,1)是我国最早的凤凰图案。而高庙遗址发现的距今约7400年前的白陶上戳印着两只飞翔的神鸟凤凰^[7], (图一,2)比河姆渡遗址早400年左右。也有专家表示,高庙遗址出土的凤鸟图案作为考古实例,证明中华民族的凤凰崇拜始于高庙文化^[8]。

高庙文化白陶上的凤鸟纹图像造型奇特、丰富多变,有正向凤鸟首、几何化凤鸟首、侧面相对双凤鸟首、侧面相背双凤鸟首和上下正负形构图的全凤鸟等完整造型;或抽取凤鸟的局部元素,如凤鸟首、翼、爪或尾进行变形、移位或折叠重构而成;还有凤鸟纹与太阳

纹、獠牙兽面纹、八角星纹、条带纹、波折纹、梯形纹和垂幔纹等抽象几何纹组合而成的复合型纹样。根据凤鸟的造型和组合关系可分为五型。

A型:对凤鸟。根据凤鸟造型,又可分为三亚型。

Aa型:凤鸟全身侧面。凤头居中,嘴或微张,勾喙,圆目。头上有弯曲的羽冠,双翅呈展飞状,通常有一到三个翼尖。羽翼装饰有太阳纹、八角星纹等纹样,下部装饰飘带状尾巴。(表一,1、2)

Ab型:凤鸟半身侧面。凤头居中,嘴或微张,勾喙,圆目。头上有弯曲的羽冠,双翅呈展飞状,通常有一到三个翼尖。羽翼装饰有太阳纹或八角星纹等纹样,下部无尾,装饰带状垂幔纹、波浪纹、平行线或折线等。(表一,3)

Ac型:凤鸟倒置半身侧面。凤头居中,嘴或微张,勾喙,圆目。头上有弯曲的羽冠,两翼翘起以心形或弯钩状相连,尾部延伸为不规则“回”字形,下部为反向连续“上”形带状纹。(表一,4)

B型:侧面凤鸟。根据凤鸟侧面形象,又可分为两亚型。

Ba型:凤鸟全身侧面。整体呈线性几何简化造型,凤头昂首,尖喙,圆目。有两条线状的羽冠,方形单翅,两侧双翼或张开或合拢,羽翼上各有一象征太阳的圆圈图形。两条平行“フ”组成凤尾,连续排列成带状装饰。凤鸟身体部位装饰单个或多个獠牙,



图一 双凤鸟纹

- 1.“双凤朝阳”牙雕(河姆渡遗址T226③B:79)
- 2.戳印双凤鸟纹白陶(高庙遗址05T14-04:34)

凤鸟两侧也间隔装饰横式或竖式獠牙。（表一，5、6）

Bb型：凤鸟半身侧面。凤头居中，下部无尾。双翅中心出现獠牙神面，或以獠牙作为装饰，或以獠牙替代双翅，獠牙形象多为横向构图，也有竖立式。（表一，7）

C型：正面半身凤鸟。在中部本为凤首的位置以獠牙兽面形象代替，左右几何化双翅展开，形成獠牙展翅飞翔造型，凤鸟形象特征不明显，似鸟非鸟、似兽非兽。（表一，8）

D型：“B”形凤羽。用凤鸟的羽翼（毛）来代表凤鸟，以斜置双线刻画“B”形羽翼，

形成二方连续装饰带状纹样。（表一，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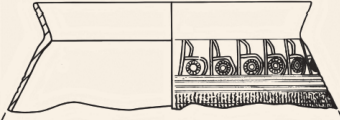
E型：复合凤鸟。凤鸟与太阳纹、獠牙兽面纹等组合而成。（表一，10）

通过上述分类可以看出，高庙文化白陶上的凤鸟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凤鸟多为全身或半身侧面形象，头上大多有卷翘的羽冠，几何化双翼向两侧展开。二是复合图案中，凤鸟纹与太阳纹、八角星纹和獠牙兽面纹组合样式最多，两种或多种元素混合叠加，形成复合式纹样。三是凤鸟多成对出现，两两相对或相背，两个及以上单元构成二方连续纹样，排列装饰在各类型白陶

表一 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类型表

类型		绘制图例	实物图例
A型： 对凤鸟	Aa型： 全身侧面		
		1. T2G1② : 84	
		2. T3G1③ : 10	
	Ab型： 半身侧面		
		3. T3G1② : 61	
	Ac型： 倒置半身 侧面		
		4. T3G1② : 64	

续表一:

类型		绘制图例	实物图例
B型: 侧面凤鸟	Ba型: 全身侧面		
		5. T2G1② : 28	
	Bb型: 半身侧面		
		6. T3G1② : 65	
C型: 正面半身凤鸟			
		8. M41 : 1	
D型: “B”形凤羽			
		9. 05T12-02⑤ : 1	
E型: 复合凤鸟			
		10. T1G1② : 92	

注: 表中白陶实物图由张朋川摄。1、3、4、6、10采自注释[4]上册第12页, 2采自注释[4]上册第88页, 5采自注释[4]上册第32页, 7采自注释[4]上册第66页, 8采自注释[4]上册第13页; 9采自注释[3]第281页。

器物的口、领、肩、腹和底等醒目部位，个别器物圈足内壁和底部外侧等隐蔽部位也有施纹现象。四是凤鸟纹饰多采用刻画和戳印的装饰工艺，在陶器表面戳印出篦点或方格形凹纹，形成浅浮雕效果。此外，千家坪遗址早期的白陶簋残片上有一些凤鸟造型，整体形象并不完整，只有部分纹样留存，（图二）暂无法将其归入上述分类。另外，千家坪遗址部分陶器上的凤鸟纹形象，学术界对其造型界定存在不同观点，无法归入上述类型，对其样式的考证需另当别论。

三、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意象分析

“白陶的纹饰，与其说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毋宁说是古人精神意识的图像表达。白陶的纹饰，显然不是简单的装饰艺术，而应该具有象征意义，其所传达的既是宇宙观与哲学思想，也是信仰和情怀。”^{〔9〕}高庙文化白陶上的纹饰从造型到排列布局，乃至色彩搭配，都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这取决于当时人们对世界万物的主观认识与理解，是高庙先民“观物取象”的结果，也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审美特征。

（一）自然崇拜的象征意义

泰勒认为：“太阳崇拜较之其他物神更早。”^{〔10〕}人类对太阳的崇拜，一方面是人

们对太阳朝升夕落的神秘幻想，另一方面与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活动有关，太阳带来的光明和温暖成为先民顶礼膜拜的对象^{〔11〕}。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有太阳与凤鸟组合的图像，并由此引申出“金乌负日”等神话母题。例如《山海经·大荒东经》就有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12〕}《淮南子·精神训》中“日中有踰乌”^{〔13〕}也把太阳与乌联系在一起。高庙文化陶器上那些载着太阳飞行的鸟，多数学者认为就是凤鸟。而殷墟甲骨文“凤”和“风”字通用，即“𩇛”，其义为风，其形如鸟^{〔14〕}。《左传·昭公十七年》亦有记载：“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15〕}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人们认为凤鸟是主导四季变化的风神，其形象与气候变化、四季交替相关。这些神话反映出，古人认为凤鸟是载着太阳飞翔于天地之间并能通晓节气和历法的神鸟。

高庙文化白陶上的凤鸟纹大多是复合型图案，凤鸟的翅膀上装饰着很多类似“⊙、◎、⊖、+、⊕、×、⌘、☆、◇”的神秘符号。《古文字释要》中“日”的甲骨文字形为“☉、☼、𠄎”，金文字形有“𠄎、𠄎”^{〔16〕}。而在高庙遗址曾出土1件白陶簋，外底中心绘有太阳纹，图像的中间用1个实心的大圆代表太阳，周围环绕15个不规则的小圆，以表示太阳向四周发出的光芒^{〔17〕}。（图三，1）“+”或“×”符号也是史前与“日崇拜”有关的符号。张晓霞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十字结构的符号，包含着与太阳、日神相关的象征意义。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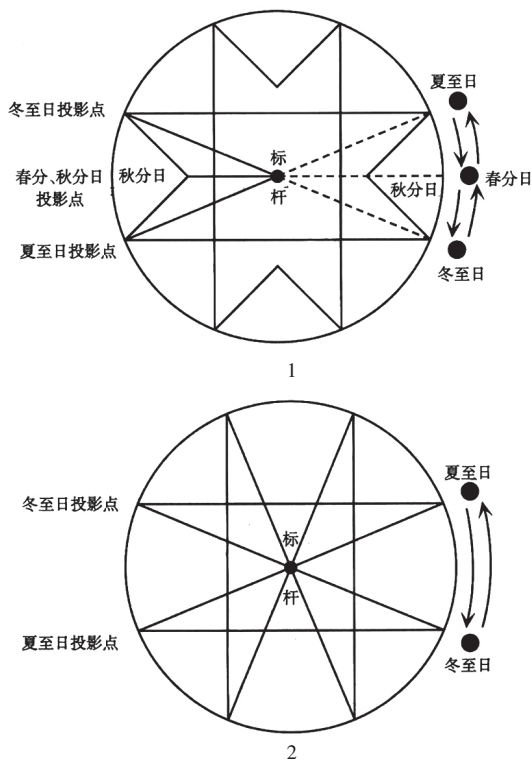
图二 千家坪遗址白陶簋凤鸟纹（H35：1）

1. 实物图例（张朋川摄）

2. 绘制展开图（采自注释〔4〕上册第12、17页）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十字形徽纹……在金文中还有对十字符号膜拜的徽纹。”^{〔18〕}（图三，2）

凤鸟羽翅上装饰的无论是规则八角星符号“✠”，还是变形的八角星符号“✧”，很多学者都认为这些是太阳的象征，“十”字代表四面，八角代表八方。贺刚曾提出：“八角星图像，除了与方位、历法有关外，还与远古时代的八卦有关。高庙文化先民就是依据周年性日投影的原理制作了八角星图像”^{〔19〕}。贺刚还以图文证明八角星图像是一种判断季节和时历的符号，即依据太阳在一年中的运行轨迹，分辨春、夏、秋、冬四季节气更迭，东、西、南、北四方位置及昼夜更替。（图四）早在《淮南子·精神训》中就有记载：“古未有天地之时，惟像无形，窈窕冥冥……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成。”^{〔20〕}有学者认为古时陶纺轮上的八角纹也与太阳崇拜有关，极有可能是八方或者八极观念的象征^{〔21〕}。而在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的方形玉器中心也刻画有八角星纹^{〔22〕}，（图五，1）有学者认为是对“天圆地方”宇宙模式的概括^{〔23〕}。张朋川先生在将柿蒂纹与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花形纹进行比较时提到：“四面八出式的花形纹……形成



图四 八角星图像测日投影示意图
1. 四时日投影线 2. 对角日投影线
（采自注释〔3〕第338页）

了中心为花形纹、天圆地方，通连四面八方的图式。”^{〔24〕}而高庙遗址出土白陶凤鸟羽翅上的八角星纹和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玉鹰^{〔25〕}上的八角星图像形态十分相似。（图五，2）由此可见，这些载着八角星的凤鸟纹与人类的

宇宙观密切相关，或许是早期天文历法与八卦的雏形。基于以上考证，推断白陶凤鸟羽翼上装饰的类似“☉、◎、⊙、+、⊕、×、⊗、✠、✧”符号均与太阳形象和宇宙图式有着密切关系，是朴素的“日崇拜”观念或“天圆地方”宇宙观的象征，表达了早期人类对日月星辰宇宙天体的自然崇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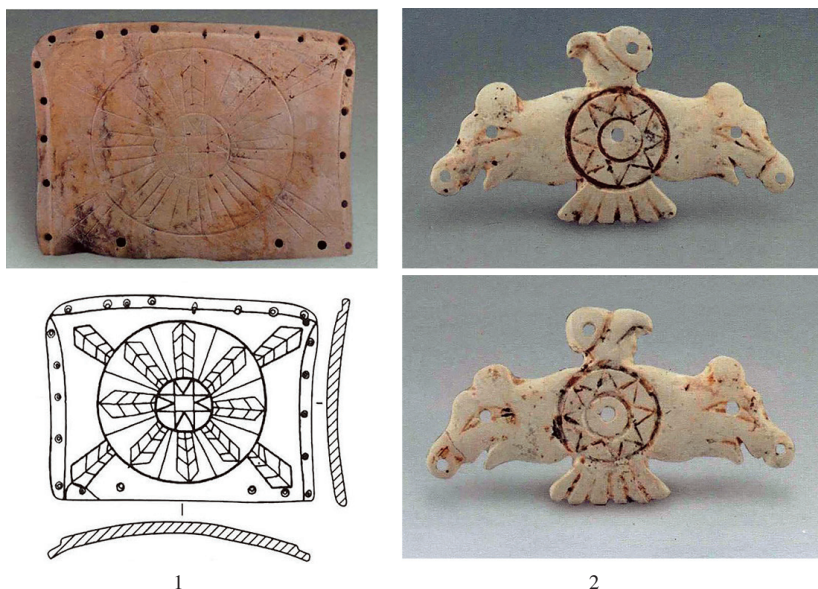
1



2

图三 象征符号

1. 高庙遗址白陶簋（05T14-02②：3）（采自注释〔3〕彩图18）
2. 金文“十”徽纹（采自《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866页）



图五 安徽凌家滩遗址八角星纹图像
1. 玉器 (87M4:30) 2. 玉鹰 (98M29:6)

(表二)

(二) 礼仪宗教的象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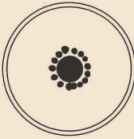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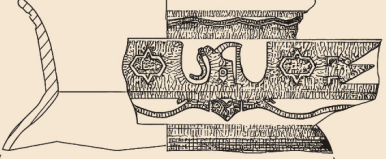
首先,关于高庙文化出土白陶的性质,贺刚认为高庙文化先民发明白陶器物的重要原因是礼神需要,而非日用。因此,高庙文化的白陶属于礼神之器,具有祭器的性质,与当时人类的神灵信仰和祭仪等精神世界息息相关^[26]。其次,白陶器物上的凤鸟纹应属于神灵信仰题材。商代甲骨刻辞中有关于凤鸟的记载,例如《卜辞通纂》载:“于帝史(使)凤,二犬。”^[27]《甲骨文合集》释:“贞,羽癸卯,帝其令凤。”^[28]甲骨刻辞所说的“帝史(使)凤”或“帝其令凤”,证明先民认为凤鸟是具有神性的天帝使者,是辅佐上帝的“帝臣”。《甲骨文合集》中还有“辛未卜,帝凤不用,雨”^[29],直接称其为“帝凤”。因此,高庙文化陶器上的凤鸟图像,双翅上或载着太阳,或负着獠牙兽,应是具有超越自然和超凡神力的存在,是先民崇拜和敬仰的神。人们认为凤鸟不仅是天帝的使者和助手,也是帮助人们灵魂升天的工具和载体。

在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上还发现了神灵通往天庭的天梯和建木图像,类似祭祀仪式的场景。例如陶罐(05T11-02④:13)的图案可分为上、下两层带状图案,上层的复合图式由八角星纹、羽翅状凤鸟纹、圆形天体纹和柱状纹构成:八连弧状的八角星内为象征太阳的圆形,圆形内为内凹四连弧,八角星外围为圆形天体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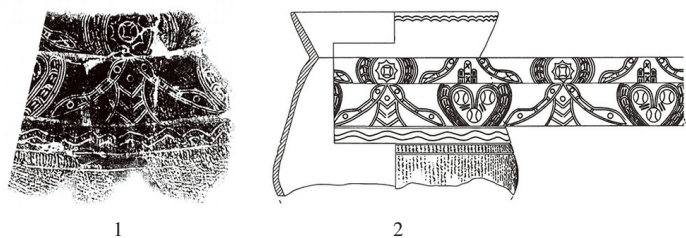
两组八角星纹中间为“八”字形对称展开的羽翅状凤鸟纹,凤鸟纹中间为三个柱形组成的“山”形柱状纹。下层的复合图式为兽面纹、羽翅状凤鸟纹、圆形天体纹和天梯纹构成:兽面外缘用双弧线围成一张桃形的脸,内部戳印三个圆形,上部的双圆表示双眼,下部单圆表示兽嘴,在兽嘴的上方两侧用斜向双短线表示鼻梁,环绕在兽面纹外围的是圆形天体纹,两组兽纹中间为“八”字形对称展开的羽翅状凤鸟纹,其下方有圆形太阳纹和通往天界的梯形纹。(图六)又如陶罐(04T1016⑬:1),腹部装饰带状凤鸟复合纹样,画面上层是对称布局的一对凤鸟载着獠牙飞升的图像,两组凤鸟之间有“丰”形的建木类图案。(图七)《山海经·海内南经》释:“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纁、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菡,其名曰建木。”^[30]在古时人们的认知中,神仙和巫师到达天界需要借助天梯或建木等工具,而高庙遗址白陶上刻画的羽翅状凤鸟纹与天梯、建木类图形相结合,已不只是普通的装饰性图案,其内在含义更是表达

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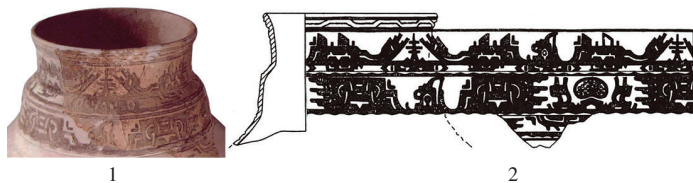
高庙文化白陶上装饰太阳与宇宙图式符号表

象形符号	图案实物图	同类型的拓片或展开图
	 1. T3G1③ : 60 (千家坪)	 8. 05T14-02②① : 3 (高庙)
	 2. T3G1② : 64 (千家坪)	 9. 91T2003②① : 12 (高庙)
	 3. T1G1② : 517 (千家坪)	 10. 5T14-01①⑨ : 34 (高庙)
	 4. T1G1③ : 23 (千家坪)	 11. T1G1③ : 23 (千家坪)
	 5. T14④B : 11 (千家坪)	 12. T3G1② : 69 (千家坪)
	 6. T3G1③ : 59 (千家坪)	 13. 91T0914①④ : 43 (高庙)
	 7. T3G1③ : 10 (千家坪)	 14. T3G1③ : 10 (千家坪)

注：表中1、2、12采自《湖南桂阳千家坪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5集）》，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36页；3~7、11、14采自注释〔4〕；8~10、13采自注释〔3〕。



图六 高庙遗址复合式凤鸟纹陶罐 (05T11-02④:13)

1. 拓片 2. 绘制展开图
(采自注释[3]第242、443页)

图七 高庙遗址复合式凤鸟纹陶罐 (04T1016⑬:1)

1. 实物图例 2. 绘制展开图
(采自注释[3]彩图27、第309页)

了当时人们精神世界中对神灵的信仰和死后升天的企盼。由此证明,此类器物是具有祭祀和宗教意义的。

此外,高庙遗址出土的很多陶簋上,图案的装饰部位也能反映器物的特殊功能。簋形器大都在外底戳印獠牙兽面的图像或绘制太阳纹,而且部分器腹外壁戳印的带状凤鸟纹图像都是倒置的,此种装饰特点的陶器在高庙遗址中数量不少,这不是偶然。日常将器物口向上、底向下正常摆放时,器物外底的图案是无法看到的,外壁上倒置的图案也很难被识别。而如果将白陶器物口朝下、底朝上倒置摆放,圈足底部的獠牙图像或太阳纹就很容易被看到,此时外壁上的凤鸟纹呈鸟头朝上正向的飞翔姿态。显而易见,这些陶器的摆放方式应是倒置的,且器物上的图案不仅是单纯的装饰目的。因此,从陶簋倒置的摆放方式上推断,其不可能是通常意义上的生活用品,反而与民间流传的巫术和祭祀活动中的器物陈设方式十分契合^[31],倒置的陶簋或许象征整个宇宙世界。所以,器具圈足外底上的獠牙兽面图像和太阳符号代表着“天神”,器腹上的凤鸟纹样飞翔在空

中,这些应该都是古时祭祀所要祈祷和祭拜的神灵。

四、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的装饰特点

高庙文化陶器上的凤鸟纹造型样式奇特繁缛、变化丰富,具有形式美感,体现了先民独特的审美取向和朴素的精神信仰。同时,白陶上装饰的凤鸟纹在工艺技术、艺术构图、元素组合、色彩呈现和神灵信仰等方面,对后世凤鸟纹样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跨时

空、跨区域和跨谱系的影响。

(一) 戳印刻画的技术

“高庙文化是华南地区史前遗存篦点纹装饰艺术的肇始者”^[32]。除了戳印篦点纹,高庙文化中还有戳印成圆圈的印纹。陶器上的凤鸟纹、獠牙纹以及几何纹都是由点构成的。陶罐的颈部或足部多以刻画工艺装饰平行双短线,腹部则划一周或几周的平行线,再间以交叉短线,形成划断绳纹的效果。连续的点构成线,连续的线又构成面。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通过戳印和刻画工艺组合,综合运用平面构成中点、线、面的形式语言,形成曲与直、疏与密、虚与实、黑与白、动与静的对比关系。同时,综合运用均衡、反复、连续、间隔、重叠和交叉的形式法则,线中带点、面中有线,形成美的节奏和韵律,以此呈现出凤鸟纹多样的造型和排列方式。高庙文化陶器上戳印和刻画的浮雕式的凤鸟纹图像,也为后世玉器和青铜器凤鸟图案提供了重要范式,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凤^[33]和石家河文化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凤^[34],(图八)且对其他载体上凤鸟纹制作工艺的影响也甚为深远。



图八 玉凤

1. 妇好墓 (M5: 350) 2. 罗家柏岭遗址 (T32③A: 99)

(二) 艺术构图的形式美感

白陶上装饰的风鸟纹样在排列和布局上,也具有一定的形式美学规律和艺术构图特点:有的凤鸟形象以二方连续式纹样构成主题纹饰;有的凤鸟形象以带状形式呈现,凤鸟纹与其他几何纹,如直线、曲线和波浪线等相互搭配,形成一周或数周带状层叠装饰;有的为成组的凤鸟纹对称等分、间距匀称、排列整齐;有的成对的凤鸟纹对半拆分、首尾相连、共生同构;还有的与多个太阳纹、八角星纹、獠牙兽面纹构成一组较为抽象的复合纹饰,构图复杂、变化丰富。贺刚将其归纳为二方连续、带状层叠、对称等分、对半拆分和二元复合五种最主要的艺术形式^[35]。高庙文化应该是这种艺术构图法则和形式美学规律的源头,无论是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上的鸟纹、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羽冠人面图像,还是商周青铜器上的各种凤鸟类神灵图像,基本都属于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艺术构图规律的

缩影。形式美学规律和艺术构图范式,赋予历代各类载体上凤鸟装饰纹样条理性和秩序感,达到变化中求统一、统一中求变化的形式美感。

(三) “凤鸟载日”的自然崇拜

“高庙文化创造了迄今所知太阳鸟最早的绘本神话”^[36]。高庙文化陶器上常见的“凤鸟载日”的复合图像,反映出凤鸟当时就担当着沟通天地神灵的重要角色。从高庙文化白陶到河姆渡文化牙雕,再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凤鸟载日”主题的图像都有出现。例如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凤朝阳”牙雕和“双鸟载日”骨雕器具^[37]。(见图一,1;图九,1)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上,绘有与高庙文化白陶相似的侧面“凤鸟载日”图像^[38]。(图九,2、4、5)而在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画类似“𪛗”“𪛘”符号^[39], (图



图九 太阳与凤鸟组合图像

1. 河姆渡遗址 (T21④: 18) 2. 庙底沟遗址 (H59: 29) 3. 陵阳河遗址 (79M25: 1) 4. 庙底沟遗址 (H323: 47) 5. 泉护村遗址 (H165: 402) 6. 陵阳河遗址 (采: 01) 7. 陵阳河遗址 (79M25: 1) 8. 金沙遗址 (2001VQJC: 477)

九, 3、6、7) 有的学者认为是鸟的简化或变形, 是巫师借用来沟通天地的巫术符号^[40]。还有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41]。(图九, 8) 以上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对太阳的崇拜以及信仰神鸟能沟通天地、引魂升天的心理。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上追溯, 其他遗址出现的太阳和凤鸟组合图像, 都晚于高庙文化早期遗存。由此可见, 凤鸟神信仰和“凤鸟载日”的神话均是对太阳神崇拜的体现, 与太阳神信仰的传播轨迹基本相同, 皆是由高庙文化传播而来。

(四) 龙凤神灵的精神信仰

中国自远古以来, 对龙凤神灵的崇拜和信仰已成为历代先民的精神支柱。纵观中国历代祭祀礼器的装饰纹样可以发现, 以龙、凤为主题的图像一直是这些通灵祭器所描摹的传统物象, 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凤鸟类神灵的敬畏和崇拜。而高庙文化白陶上戳印的凤鸟纹, 或许正是龙凤神灵祭祀传统的渊源所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和龙凤纹, 春秋战国时期楚墓出土的刺绣龙凤纹样的丝织品、绘有凤鸟图案和凤鸟造型的漆器等, 同样反映了当时的贵族阶层继承了对龙、凤神灵崇拜的传统。这些考古遗存既是当时人们精神信仰的有力物证, 也间接证明了后人对高庙文化神灵信仰体系的传承与发展。

(五) 宗教意味的神秘色彩

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在烧制过程中多夹杂细小石英砂, 胎体细密, 外观华丽。白陶呈色有乳白、乳黄、灰白和牙白等, 据分析这与胎料和烧成温度有关^[42]。陶器器表填彩或者绘彩工艺在高庙文化晚期才出现, 其装饰方式为在戳印窠点的凹陷部位填彩, 或在素面凸出的部位绘彩。出土的部分白陶片在其下凹部分填涂有朱红色或黑色的矿物颜料^[43], 而且“这些陶器往往也是出土于祭祀场所中, 与祭祀活动遗迹处于同一地层, 这显示了这些器

物作为祭祀用具的宗教属性”^[44]。由此可确认, 这些白陶当时被视为礼器, 和祭祀活动有关, 人们通过对器物的材质和颜色来渲染其特殊性, 用于重要的仪式活动, 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高庙文化陶器上红、白、黑三色的色彩对比, 也对仰韶文化等彩陶的色彩表现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结 语

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凤鸟纹饰, 无论是其戳印刻画独特工艺、艺术构图的形式美感、宗教意味的神秘色彩, 还是最早的日鸟组合的自然崇拜和龙凤神灵的精神信仰, 都对我国古代陶瓷史和装饰艺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凤鸟纹的装饰载体和材质不断变化, 装饰的工艺和技艺更为精细, 图案的造型和风格也日趋多样, 色彩的组合和搭配也逐渐丰富。但纹样和图像背后所蕴含和表达的神灵主题、艺术构图、象征寓意却一脉相承、历久弥新, 继而影响到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纺织服装、工艺美术以及建筑装饰等各个领域, 成为中国传统凤鸟纹图式和美学的艺术典范。同时, 高庙文化的白陶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 其上装饰的凤鸟纹对探讨中国古代史前人类的宗教信仰和神话观念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总而言之, 高庙文化白陶凤鸟纹作为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凤鸟纹, 其装饰艺术和象征寓意都揭示出当时的社会风尚、审美意趣和精神信仰, 蕴含了早期的自然图腾崇拜和宇宙时空观念, 也促进了后世凤鸟纹装饰艺术的多元化演变和多样化发展。

[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2000, (4).

- [2] 贺刚.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考古发掘获重大发现. 中国文物报, 2006-01-06 (01).
- [3] 贺刚. 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 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336, 337.
- [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凤舞潇湘: 桂阳千家坪出土陶器. 北京: 故宫出版社, 2020: 10~14.
- [5] 王仁湘. 飞翔的獠牙: 面目狰狞的光明使者: 高庙文化白陶艺术的神面獠牙与阳鸟. 百色学院学报, 2021, (1).
- [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姆渡: 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彩版五六.
- [7] 易禹琳. 沅湘飞出一只中国神鸟. 湖南日报, 2019-05-21 (05).
- [8] 同[2].
- [9] 郭伟民. 湖南史前时代的考古学观察. 船山学刊, 2022, (1).
- [10]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 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695.
- [11] 何星亮. 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2: 146.
- [12] 袁珂, 校注. 山海经校注.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408.
- [13] 刘安, 等, 编著. 淮南子: 精神训. 高诱, 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69.
- [14] 王大鹏, 邵莉. 甲骨文常用字集字字典.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2: 48.
- [15] 左丘明, 撰. 左传. 杜预, 集解.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823.
- [16] 李圃, 郑明. 古文字释要.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 648.
- [17] 贺刚. 高庙遗址出土白陶概论 // 湖南考古辑刊: 第8集.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167.
- [18] 张晓霞. 论中国古代十字形图纹. 苏州大学学报(工科版), 2006, (5).
- [19] 同[3]: 339.
- [20] 同[13]: 68.
- [21] 刘锡诚. 中国原始艺术.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 432.
- [2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 1989, (4).
- [23] 李零. 中国方术考.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110~112.
- [24] 张朋川. 宇宙图示中的天穹之花: 柿蒂纹辨. 装饰, 2002, (12).
- [25]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含山县文物管理所.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 考古, 1999, (11).
- [26] 贺刚, 陈利文. 高庙文化及其对外传播与影响. 南方文物, 2007, (2).
- [27] 郭沫若. 郭沫若全集: 考古编: 第二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3: 99.
- [28] 胡厚宣. 甲骨文合集释文.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672.
- [29] 同[28]: 34150.
- [30] 同[12]: 329.
- [31] 同[17].
- [32] 同[26].
-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图版三二.
- [3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报, 1994, (2).
- [35] 同[3]: 359~369.
- [36] 同[5].
- [37] 同[6]: 图版八〇, 3.
- [38]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庙底沟与三里桥: 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二.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图版二四, 图版六.
b.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华县泉护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35.
- [39]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 济南市博物馆. 大汶口: 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4: 118.
- [40] 孙长初. 大汶口文化“8”符号新解. 东南文化, 2005, (3).
- [41]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都金沙遗址Ⅰ区“梅苑”东北部地点发掘一期简报 // 成都考古发现: 2002.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96~171.
- [4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辰溪县松溪口贝丘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2001, (6).
- [4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2006, (7).
- [44] 刘礼堂, 周翠云, 王远方. 从新石器考古学文化看长江中游地区的原始宗教. 江汉考古, 2022, (1).

(责任编辑: 张 萍)